

文献检索 与论文写作

(社会科学部份)

汪恩来

张其中 编著

解晓亮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社会科学部分)

汪恩来 张其中 解晓亮

编 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八月

责任编辑：李豫江

封面设计：文绍安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社会科学部)

汪恩来 张其中 解晓亮

编 著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社会科学部)

汪恩来 张其中 解晓亮

编 著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875印张 21千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616—0972—8/G·196

定 价：5.00元

前 言

任何种类的学校，在限定的时期和教学科目内所能给予学生的知识，是很有限的。而现代社会的知识，又正以更高的速度在增长、在老化。层出不穷的新知识，迫使人们终身学习，以防落伍。在科学研究中，往往谁最先、最全面地占有了有关资料，谁就有可能最先获得成果，取得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要获取自己所需的那个小小的局部，则并非易事。因此，需要一种方法，这就是文献检索与利用的知识。人们掌握了这种知识，就得到了读书治学、捕捉知识与情报的根本方法，在学习、工作和科学研究中，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有鉴于此，原教育部于1984年2月发出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指出“凡有条件的学校可作为必修课，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可作为选修课或先开设讲座，然后逐步发展、完善。”同时，对课程的内容也作了四项规定：1. 文献与文献检索基本知识；2. 主要检索工具的内容、结构及查找方法；3. 主要参考工具的内容、作用及使用方法；4. 阅读方法与技巧、论文写作方法、文献整理与综述、情报分析研究等等。嗣后，一些高等学校开设了《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虽然各校使用的教材内容、体例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都颇受学生的欢迎，他们称，这门课程给了他们一只“点石成金的手”。

在为数众多的成人高校，则尚未正式开设这门课程，而在成人高校就读的学生，往往更需要文献与文献检索知识。同普通高校学生相比，他们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资利用，也更缺乏通过图书馆查询和检索文献的知识与技能。广播电视大学、各类职工业余大学的学生，每每在撰写毕业作业时遇到不会搜集和查询资料、不知如何着手写论文的困难。社会上还有更多的自学者在自学深造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也因为不会检索和利用文献，而往往事倍功半。为此，我们为各类成人高校的学生和广大自学者，编写了《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社会科学部分）》这本书，企图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日后的深造助一臂之力。

本书共八章，第一至四章由《四川图书馆学报》主编、研究馆员汪恩来编写；第五、六章由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副研究馆员张其中编写；第七、八章由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解晓亮编写。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成都广播电视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和《四川图书馆学报》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1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献概述	(1)
第一节 什么是文献	(1)
第二节 不同载体的文献	(5)
第三节 不同编辑出版形式的文献	(16)
第四节 不同时代的文献	(23)
第五节 文献的级次	(29)
第二章 文献的社会功能和特点	(45)
第一节 文献的社会功能	(45)
第二节 社科文献的特点	(58)
第三章 文献排检	(63)
第一节 文献的分类排列	(63)
第二节 文献分类排列的作用	(80)
第三节 文献的主题排列	(82)
第四节 文献的字顺排列	(88)
第四章 文献检索的程序与策略	(94)
第一节 文献检索与检索工具	(94)
第二节 文献检索的程序	(96)
第三节 文献检索的策略	(100)

第四节	文献检索的发展前景	(102)
第五章	社科检索工具书举要	(105)
第一节	怎样检索历史人物	(107)
第二节	怎样检索书刊论文资料	(121)
第三节	怎样检索诗词文句典故	(136)
第四节	怎样检索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资料	(147)
第六章	社科参考工具书举要	(156)
第一节	怎样查考百科资料	(156)
第二节	怎样查考时事文献	(178)
第三节	怎样查考历史年代、月份、日期和大事	(192)
第四节	怎样查考图像资料	(202)
第七章	地方文献的利用	(209)
第一节	什么是地方文献	(209)
第二节	地方文献的作用	(216)
第三节	四川主要地方文献	(218)
第四节	四川地方文献的检索和利用	(244)
第八章	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257)
第一节	论文写作	(257)
第二节	文献对论文写作的作用	(284)
第三节	论文写作中的文献检索	(290)

第一章 文献概述

第一节 什么是文献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文献这个概念的涵义，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致长期以来，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各不相同，在不同的场合，也近乎随意地搭配使用，比如“图书文献”、“文献情报”、“文献资料”等等。因此，弄清文献的渊源，对于正确理解文献的含义并正确地使用它，是必要的。

在我国，文献一词始见于《论语》。《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徵，即证明、证验的意思。夏，即夏朝，相传为禹所建立的奴隶制国家，约为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夏礼，即夏朝的政治制度。杞，古国名，相传周武王灭商后封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而得名，其地在今河南杞县，后为楚国所灭。殷，即商朝，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11世纪。殷礼，即殷朝的政治制度。宋，古国名，因杞王灭商后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旧都（今河南省商丘县），后武庚叛乱被杀，又以其地封纣的庶

兄微子，号宋公，是为国名，春秋时期为十二诸侯之一，至战国时为齐所灭。孔丘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夏朝的政治制度我能讲述，而杞国的政治制度我却不能证明，殷商的政治制度我能讲述，而宋国的政治制度我却不能证明，因为文献不足。如果有足够的文献，我就能够证明了。南宋理学家朱熹解释孔丘这段话中的文献一词说，“文，典籍也；献，贤也。”又据《尔雅·释言》：“献圣也”。这里，“贤”和“圣”都指学识渊博的人。集中起来，文献指的是典籍与博闻多学的人。

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命名的宏篇鉅制是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他在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在这里，马端临把文献一词释为典籍与贤者之言。但是将那些他认为历代著述及名流之言、稗官野史中的乖异传疑、淆乱史实之类，都排除在外了。显然，马端临的这段话，并非人们通常引证时所说的，他把文献一词解释为“文是指录之于书的文字，献是指传之于口的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基础》，魏克智等编着，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6年8月，第23页）。事实上，马端临只是按他的政治、社会和学术观点，把历代典籍、著述和名流言论中的一部分看成是文献，因此，并不能作为文献一词的科学定义。

我国现在最有影响的两部大型辞书《辞海》和《辞源》在释文献一词时，都以《论语·八佾》、朱熹注和马端临《文献通考》为据，认为“原指典籍与宿贤。……今专指具

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这个定义也同样规定了一些“条件”，一是要“具有历史价值”，一是“重要的图书资料”，此外，把“文物”也视为文献。而文物，自然包括诸种历史遗留的实物。显然，这两部辞书对文献一词的解释，也是不确切的。

近些年来，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有人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文献是“用文献记录手段记录下来的正式发表的人类知识”；“经过较多加工的、具有较长时间利用价值的比较正规的资料，包括出版物和档案两大类型。文献又被称为文献资料，以区别于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用文字、符号或图形等方式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信息载体，是人类脑力劳动成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和继承下去，人们用文字、符号、声频和视频等手段将其记录下来，或写在纸上，或晒在兰图上，或摄制在感光片上，或录制在唱片上，或贮存在磁带上。这种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录，统称为文献”等等。

上述这些定义大都从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本质特征出发，规定了一些特殊的前提条件，如“正式发表”的，“正规”的，为了“传播”和“继承”知识，“纸”、“蓝图”、“感光片”、“唱片”、“磁带”等等。这些前提条件，实际上又将一些与之不符的东西，排斥在外了。

文献这个概念，人们至少使用了二千多年，而且发展出一门新学科——文献学。但是，对文献这个概念的定义，却未能最终一致起来。这种现象，是许多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并非文献学所独有。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思维方法、角度都有所变化，

人们所得到的结论，自然不尽相同。

随着文献工作——包括图书馆工作、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人们需要对广泛使用的科学术语，予以规范，以便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基础。为此，我国国家标准局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文献著录的国家标准，其中，《文献著录总则》（GB 3792·1—85）把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国家标准中所给定的这个定义，是一个内涵定义。记录知识的载体，可以是任何物质，记录用的手段、方法也可以是无限制的，所记录的内容只要是知识就行，而不论其有无历史的、科学的、艺术的、认识的价值。由于这个定义的内涵很小，所以，它的外延就特别大，以致我们几乎无法穷举。举凡迄今为止出现过的甲骨之书、缣帛之书、金石之书、泥版之书、羊皮之书、竹简、木牍、图书、报刊、档案、手稿、图谱、录音带、录像带、缩微制品、机读资料等等，都是文献，而不论它们的内容属于什么学科、有什么样的历史、科学、艺术和认识价值，也不论其思想倾向、政治倾向如何。

本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献这个概念的。

既然“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都是文献，它的种类和形式自然是极其繁多的。为了管理和利用文献，人们就需要对它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以便掌握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同其所同，异其所异”，就是一种常用的、可以举一反三的科学方法，即分类的方法。

我们根据文献研究和使用的不同要求，往往选择不同的标准来进行划分。通常在对文献进行形式分类时，选择载体形式、编辑出版形式、时代和加工深度等标准，来进行划

分。

第二节 不同载体的文献

载体形式的演变，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也是记录、传播知识和贮存与利用文献的需要。在文献发展史上，在纸发明之前，人类使用过许多种载体材料，基本上是以适用、易得为原则。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适应文献传递与保存的特殊要求，人们又发明了更多更新的载体和记录手段。因此，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和正在使用的文献载体，是多种多样的。研究和掌握文献的诸种载体形式，有助于合理保存和利用文献，有助于发掘各种形式的文献中埋藏着的知识。

一、甲骨的文献

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文献，它刻制或书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有时也简称甲骨文。

1899年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有刻凿文字的甲骨，开始作为药材使用，号为龙骨，1900年，王懿荣购藏千余片。王死于八国联军侵华之役，其子将所藏甲骨卖给刘鹗。1903年，刘鹗选千余片拓印出版行世，名为《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据刘鹗拓印本，予以考释，著成《契文举例》。同年，罗振玉写成《殷商贞卜文字》，考证史家违失及小学源流。1913年，又写出《殷墟书契前编》，著录龟甲二千余片，次年又作《殷墟书契考释》。1917年，王国维编成《戡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甲骨出土并被证明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文献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也引起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文化窃贼们的觊觎，比如华尔纳、明义士之辈以及后来的侵华日军，纷纷在安阳殷墟盗掘、盗买了数万片甲骨并运出境外。

从甲骨文发现迄今八十余年中，已出土十五、六万片，研究它们的著作大约一千种左右，其成就卓著者有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唐兰、郭沫若、陈梦家、容庚、商承祚、于省吾、胡厚宣等。

河南安阳殷墟，是我国商代从盘庚到纣灭亡二百七十多年间的都城遗址。从甲骨出土情况看，有的是一代五朝的甲骨存贮于一个窖穴中，有的是几代王朝的甲骨存贮于一个窖穴中。据考证，甲骨文使用的单字大约有4500个，现已可释读的约一千余个。从内容看，它们是殷代卜官的记录。殷人信鬼神，每有王事、征伐、田猎、农作、灾异等等，均由卜官占卜，将卜辞刻或写于卜骨（龟甲或兽骨）上，验应后再将验应征候补刻或补写于卜骨上。有些卜骨上还记有占卜者的名字。从大量研究中，可以知道殷墟甲骨文献中记载的事物范围极其广泛，为研究殷商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留传至今的许多古籍所记载的史实，提供了佐证。甲骨文中还有“册”、“典”这样的字，“祝册”、“觐册”、“工册”这样的词以及一些穿孔的形制，这些对于研究当时的书籍制度、甲骨的编连、保管方法等等，也提供了线索。

甲骨的文献是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遗存，也是极可宝贵的文化财富，有着很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二、铜铸的文献

我国青铜冶炼技术起源很早，传说中的禹铸九鼎，可追溯至纪元前22世纪。殷代初期，出现了以铜锡合金铸造的青铜器。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纪事、记言，即所谓“示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习礼博文之学”，称为金文或铭文。西周时期为我国历史上铸造青铜彝器最盛的时期，凡赏赐、分

封、嫁女、殉葬等等都铸造铜器。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把政令、刑书铸刻在青铜鼎彝器上的作法，以示威权、公正。青铜器上的铭文，多少不等，最少的仅一个字，多的有数百字。如著名的“毛公鼎（周宣王时铸造）有铭文近五百字。钟鼎彝器作为世守之物，得之为荣，失之为辱，又是一种权力的象征。铸造钟鼎彝器之风，一直延续到西汉。至今已陆续出土七千余件，对研究商周时代的历史、文字、语言、地理、政治制度、分封制度、祭祀、经济、习俗等等都是第一手文献资料，有的还可用来考证各类史籍的正误。重要的研究著作作为（宋）王楙的《啸堂集古录》、（宋）王黼等的《宣和博古图》、（清）《钦定西清古鉴》、（清）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近人刘心源的《古文审》、《奇觚室古金文述》、郭沫若的《三代古金文存》、《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

三、简牍文献

是以竹、木材料为载体的文献。

人们为了寻找一种更方便、更易得的书写材料，在青铜的文献出现的同时，人们又选择了竹和木。王充在《论衡·知量篇》中记述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契，析之为版，力如刮削，乃成奏牍。”就是说，把竹子锯短为竹筒，再劈开为竹片，称为简或牒，其长者写经书，其短者写解释经书的传记文字。把树木锯成短节，剖开为板，然后刨平，用来写奏章、信件之类的文字，称为木牍。据考证，周末以降，简盛牍行，无竹的地区，则以木为简，称为木简。简的长度，大都有定制。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汉尺）等。不同长度的简。书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如《史记·

《酷吏传》中所说的“三尺法”、《汉书·朱博传》中所说的“三尺律令”，就是以周尺三尺（合汉尺二尺四寸）长的简书写的法律文书。贾公彦《仪礼·聘礼疏》中记述“《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即以汉尺二尺四寸（合周尺三尺）的简书写经书。据出土的实物，一根简通常书写一行字（也有少数写二行以上的），字数最少九字，最多123字，一般在四、五字左右。一篇较长的文字，必须用许多根简来书写，为了便于阅读、保存，避免错乱。就要把简编连起来，这就成了“策”，称为简策，即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策”是“册”的假借字，在甲骨文中的、就是“册”字，是以绳编连甲骨的象形字。《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丘晚年喜谈《易》，“韦编三绝”。韦编，即编连简的绳子，三绝。即断了多次。简书编连后卷起，题目多在其后。

简策在我国使用了很长时期，从殷商时代直到东晋末年桓玄称帝（公元404年）后下令废止，前后达一千六、七百年，其间，大多数著作都是写在简策上的。

四、缣帛文献

又称帛书，是以缣帛为载体的文献。其起源略晚于简策，但并行了很长时期。

以竹木制成简牍，虽然材料易得，但毕竟过于笨重。《墨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是说惠施的藏书用五辆车子装载。而墨子本人游说诸侯时，也用三辆车子装载书籍同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每天要看的表牋奏请以石计。按秦制一石合一百二十斤，可见其笨重。《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公车上书，一篇奏章竟用了三千枚竹简。用二个人抬上殿。此外，编连简片的绳子（牛皮绳

或丝绳)也容容易拉断,造成脱简、错乱,给阅读、传递带来不便。于是,开始使用缣帛作为载体材料来书写文字。

缣帛是丝织品的统称,包括帛、素、缙、缣等,所以帛书有时又称缙书、素书、缣书。缣帛质地轻薄,长短随意,幅面宽阔,便于携带和舒卷。作为书写材料,自然比竹简,木牍先进。但它毕竟是一种丝织物,较为贵重,主要用作衣料,并非一般平民学子所能使用,是以古有“贫不及素”之说。

从《论语·卫灵公》中“子张书于绅”及《周礼》“凡有功者,铭之于王之大常”等记载看,春秋时代就以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了。《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韩非子》中也说“先王寄理于竹帛”,都说明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与竹简木牍并行,大约始于公元前七至六世纪。以后,缣帛用于书写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约千年,直到纸张普及,才逐渐被取代。

五、石刻文献

以岩石为载体,刻凿文字,纪事记言,虽不及竹木缣帛,但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即对雕板印刷术的发明,起着启迪的作用。

我国很古便有刻石的记载。《墨子·鲁问》中说“镂于金石”就是。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巡行天下,几乎每到一处都刻石纪功颂德,如峰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等即是,以后刻石之风延续不衰。

刻石因其形状不同,有摩崖、碑、碣之别。

摩崖,即把纪事的文字刻在天然石壁上。相传起源于夏商时期,现在有记载和实物可考的主要是汉和汉以后的作品。比

如陕西汉中褒谷中至今留存摩崖石刻百余品，其著名者号曰“石门十三品”，系汉至南宋一千多年间累代刻凿的纪功颂德性的文字，是研究我国古栈道和西汉水利工程的珍贵资料，亦有校补史籍之功，同时，也为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尤其是汉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碑，是把文字刻在经过加工、打磨的一种长方形石板上的，这是最常见的刻石，至今不衰，其起源却较晚。碑本来是一种宫、庙的竖石，并不刻字，《仪礼·聘礼》“东西北上，上当碑南”，郑宏注：“宫中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可见是记时用的。《礼记·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郑玄注：“丽，犹系也”，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可见是系牲口用的。汉刘熙《释名》说“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又是一种引棺下葬的工具。清龚自珍在《说碑》中说：“庙有碑，系牲栓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述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别子也。”因为是“史之别子”，所以受到史家的珍视。碑上刻字纪事、纪功，约始于汉，至今不衰。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宋欧阳修在《集古录》中也说：“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述前汉时碑碣终不可得，是则家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

碣有二说，一为经凿磨为上小下大的园柱形石材，刻文其上。陕西凤翔县出土的秦献公时的“石鼓文”即此。它产生的时代比摩崖和碑都早。另一说为碑的一种。所谓方者为